

人文中國學報叢書系列

香港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 (1950—2000)

鄭健行 吳淑鈿／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蔡德允教學及研究基金資助出版

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

(1950—2000)

鄭健行 吳淑鈿／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:1950~2000/鄭健行,吳淑鈿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.10
ISBN 7-5325-4095-2

I. 香… II. ①鄭…②吳… III. 古典文學-文學研究-專題目錄-中國 IV. Z88: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45105 號

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目錄(1950~2000)

鄭健行 吳淑鈿編

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l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

浙江省臨安市曙光印務有限公司印刷裝訂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8 插頁 5 字數 462,000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4095-2

I·1798 定價:4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0571-63781028

從出版刊物看近五十年 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

(代序)

吳淑鈿

自 1950 到 2000 年約五十年間，在香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，包括專書和學報、期刊、論文集以至報刊上的文章等，為數甚衆^①。這些資料顯示了五十年來香港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，也表現了現代香港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積極態度。

以出版刊物為主體考察近五十年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（以下簡稱“研究”）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度；刊物中有關資料雖不乏廣義範圍的研究，學術性或深或淺，但在“香港出版”的綱領下看“研究”的價值呈現，便突出了香港社會在特定時空中的集體文化意義。

本文“出版刊物”的討論範圍主要包括學報、期刊及論文集三個方面。專書及報章的資料暫不列此。五十年間，出版“研究”的這三方面的刊物共有 142 種，其中 130 餘種載有可供參考的出版史料，如“創刊詞”、“發刊詞”或停刊時的結束宣言等。以下先從出版“研究”的刊物本身作考察，再從宏觀角度論述刊物出版的“研究”概況。先論一般社會文化刊物，再論學院刊物，儘量用以類相從的方法處理資料。通過兩部分的考察與論述，歸結具社會及學術價值的出版意義，並見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香港的傳承一面。

① 鄭健行、吳淑鈿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——詩詞曲篇》總序中指出其數約為四千。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.4，頁5。）

一、出版“研究”的一般文化刊物考察

除了學院內的學報及論文集等外，純粹出版“研究”的學術性文化刊物很少，但半學術性的刊物中仍不乏相關著述。此外古典文學的研究主要寄生在文藝雜誌、教學及語文雜誌、政治文化刊物、宗教文化刊物、讀書雜誌及綜合性文化刊物中。事實上有些刊物是很難嚴格分類的，例如教學性的往往又以研究學術為宗旨，帶政治性質的刊物又不離講文化，而綜合性文化刊物中，有些學術氣味很重，有些則通俗性較強。以下試將各有關刊物大體劃分成幾個類型，並指出每一類型與“研究”的內在關係。

1. 學術及半學術性文化刊物

過往五十年出版的學術和半學術性的文化刊物，以知識分子為模範讀者，帶着高遠的文化理想。如《人生》、《自由學人》、《抖擻》、《歐華學報》、《龍之淵》、《中國文化》、《中華國學》及《九州學刊》等。《自由學人》(1956—1958)是早期的學術性刊物^①，作者皆為學院中人，如涂公遂、勞思光、余英時等，以思想哲學的論述為主。他們相信在50年代，經過歷史的苦難，中國知識分子已有相當的覺醒，在刊物中發表學人對種種學術文化問題的論著，對人類文化必定會多多少少有貢獻^②。將深重的民族憂患意識擴大至對人類前景的關注，具現高層次的文化襟抱。同期的刊物中，《人生》(1951—1971)亦展示了廣大的世界觀，他們明言讀者對象是上層知識分子，而創辦目的一在結合旅外學者提煉中國文化精華，檢討歷史，二在求中西文化會合，三在正人心救世運^③。這種立足香港、聯繫海外、放眼世界的文化觀念，一直是50年代以後大部分刊載“研究”的刊物的主體出版理念。《抖擻》(1974—1983)是七八十年

① 標籤刊物出版的時代，只記年份。出版壽命少於一年者才加記月份。

② 《自由學人》“發刊詞”，1956.8，頁1。

③ 《人生》1951.1，頁1。

代的半學術性文化刊物，創刊也是爲了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提供出版園地，交流知識與觀點^①。而《歐華學報》(1983—1993)則意在促進中歐文化的交流作用。古典文學既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在，這類刊物與“研究”的關係最是直接與密切。

《九州學刊》(1986—1993)、《龍之淵》(1988—1989)、《中華國學》(1989—1990)和《中國文化》(1989—1995)都是80年代出版的學術文化專刊，以研究中華文化爲共同宗旨。但此四種刊物在出版“研究”方面呈現的香港本土性明顯不强。《中華國學》雖說由香港國學研習社出版，以“溝通國內外漢學研究成果”爲使命，但其作者群與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中國文化》一樣，以國內學者居多。《龍之淵》的出版雄心最大，創設巡迴總編輯制，請“全世界各國的漢學優秀人材”開闢“屬於世界人民的漢學園地”，然而在刊載“研究”上則未能清楚顯示其本土性^②。《九州學刊》由香港中華文化中心出版，其言謂旨在促進學術和思想觀點的交流，則的確是兼採了一些當時在海外而後來成爲香港的學者的論述，但本土性亦欠鮮明。

2. 文藝及文學雜誌

出版“研究”的文藝和文學刊物爲數不少，僅次於綜合性文化刊物。如《熱風》、《文學世界》、《文藝世紀》、《海光文藝》、《文萃》、《純文學》、《詩風》、《海洋文藝》、《青年文學》、《詩與評論》、《文學家》、《文學與傳記》和《香港文學》等。這類刊物的共同特點是大多以刊載文藝創作爲主，以培養香港新作家或發表成名作家新作爲

① 《抖擻》“發刊詞”1974.1，頁1。

② 《龍之淵》“本刊總編輯輪流做莊制”，1988年第一期，頁1。所謂“本土性”，以本土學者及本土作者發表的論述爲主。廣義言之，出版刊物中“研究”資料的作者，無論其爲大陸、臺灣或海外的身分，都屬“香港出版資料”的作者。由於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，早期居民的流動性又相對較強，亦無從掌握所有學者和作者的生平資料，故我們就所搜查的資料，把曾留居香港，及曾任教於香港大專院校的作者資料稱爲本土性資料，也只能是一個概括的分法，一些在刊物中以筆名發表文章的資料則無從定位。

職志。所謂“研究”，一般囿於對古典文學作品的評介，多屬賞析之類的討論。其中 50 年代創刊的《文學世界》(1954—1965)出版宗旨最嚴肅，論述最質實。黃天石在《世界文學與文學世界》(代發刊詞)中宣言：“世界是文學創造出來的，文學要有共通的世界性，以世界文學來建立更理想的文學世界……文學在一個民族裡所撒下的種子，當初沒人注意，年代久遠，便凝結成爲一個民族的靈魂，再擴大而爲全世界人類的靈魂。”^①認爲文學有極爲重要的社會功能。各刊物中，《文藝世紀》(1957—1969)和《海洋文藝》(1974—1980)的“研究”資料都相當可觀，前者雖在稿約中明言接納“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”，所刊作品亦不出賞析範圍。《詩風》(約 1972—1984)是香港本土詩人刊物，研究範圍自是圍繞著古典詩歌。《純文學》(1962—1972/1998—2000)雖因“香港出版業蓬勃，文學花園荒蕪”而創刊，要“負起歷史上偉大的任務”^②。但約稿的既都是成名作家，研究部分也是以當時臺灣及海外學者的著述爲主。

3. 教學及語文雜誌

考查 50 年代以後的香港教學雜誌，兼載“研究”資料的主要有《中文通訊》、《教育曙光》、《現代教育通訊》、《新語文》、《中文學習》、《孔道專刊》、《中國語文研究》、《語文雜誌》和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等幾種。此等刊物的共同出版目的是提高香港社會的中文教育水平，研究中文教學，讓教師通過刊物交流教學經驗，故“研究”範圍不乏中學教材中的古典文學選文。《中文通訊》(1954—1990)和《教育曙光》(1961—)都屬香港教師會刊物，出版期都長達四十年，但即使宣稱以研究學術爲宗旨，“研究”的資料卻少之又少。相同情況見於《現代教育通訊》(1970—2000)、《中文學習》(1975. 9—1975. 12)和《新語文》(1970—1972)這些以討論教材爲主的刊物

① 《文學世界》1954. 4. 11, 頁 1。

② 《純文學》1967. 4. 1, 《作品·作家·讀者·時代》，頁 1—2。

中^①。《孔道專刊》(1977—1987)由民間教育機構出版,意在證明社會上中文寫作興趣不遜於英文,所載資料數量在同類刊物中較為可觀^②。《語文雜誌》(1979—1986)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,與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的《中國語文研究》(1980—1995 / 2001—)和《中國語文通訊》(1989—)相同,致力提高社會語文水平之餘,也關心文學的藝術語言研究,作者皆大學教師。但《中國語文研究》側重促進中國語文研究成果,資料所示,作者皆為海外學者,欠本土“研究”顯示。

4. 政治及宗教文化刊物

在香港,幾乎與“研究”有關的絕大部分刊物都表示不願與政治掛鉤。《民主評論》、《祖國周刊》、《祖國月刊》和《中華月報》都是50年代早期特殊政治環境下出版的文化刊物。徐復觀在1966年9月《民主評論》(1949—1966)的結束語中說最初是本著民主政治理想而創刊,他向蔣介石建議在香港辦一份刊物,為的是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,在思想上開一線光明與希望。五六年後雜誌的政治色彩漸轉稀薄,變成在憂患意識中專談中國文化問題,多在文化反省方面做功夫^③。《祖國周刊》1953年創刊,原來宗旨在致力民主中國運動。1964年改為月刊,以研究大陸問題為主。二十年後再改為《中華月報》(1973—1975),致力於推動海外中華自由文化運動,但堅稱“不可能架空研討文化思想,而不接觸政治問題、經濟問題、社會問題”^④。

《國風》、《文藝雜誌》、《法言》乃具宗教背景的文化刊物。前兩種屬基督教。香港聖公會會督在《國風》(1950)的創刊詞中有藉宗

① 《現代教育通訊》和《中文學習》都屬教育出版社的刊物,《新語文》是中華語文學會刊物。

② 由孔聖堂出版。專刊乃為出版國學研習班與徵文比賽論文選篇,要證明在香港國學仍受重視,中文寫作興趣也未退減。見《發刊詞》1977. 10,資料共25種。

③ 《民主評論》“本刊結束的話”1966. 9,頁214。

④ 《談海外中華自由文化運動——代發刊詞》,《中華月報》(1973. 4)頁4。

教以保香港“偉大城市”地位的祝願^①。《文藝雜誌》(1982—1986)辦刊目的則是讓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彼此交融。《法言》(1986—1992)屬佛教文化刊物，兼載佛教及中西文化學術著作。“研究”只兩種，都討論佛教思想與古代文人的關係。

5. 讀書雜誌

《天地叢刊》、《開卷》、《書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和《讀書人》都屬讀書雜誌一類。這類刊物大部分由具規模的圖書公司出版，如天地圖書公司(《天地叢刊》1978—1979)、商務印書館(《書海》1984—1989)、三聯書店(《讀者良友》1987—1997)等，目的在推廣讀書風氣、提供書目和評介書籍等，故“研究”資料性質多為書評序跋或校記之類，當中亦不乏本港學者的論述。

6. 綜合性文化刊物

綜合性文化刊物是為數最多的出版“研究”的一般刊物類型，有《文壇》、《展望》、《新語》、《知識生活》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廣角鏡》、《大華》、《人物》、《人物與思想》、《筆端》、《青年雜誌》、《晨風》、《盤古》、《七十年代》、《南北極》、《中國人》、《耕耘》、《大成》、《博文》、《新風》、《萬象》、《中報月刊》、《百姓》、《滬息鏡》、《九十年代》和《中華文摘》等廿餘種。這類刊物的出版或多或少均載負着時代和社會的使命感，重視內容的知識性和趣味性，藉此介紹新事物新思潮，趕上新時代。然而比起以上各類型的刊物，這個群類的主軸性質最參差；它們之中有些強調為年青人辦刊^②，有些只為出版而出版^③，有些側重評論社會問題，有些則強調不涉政治^④。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們早夭者甚眾。由60至80年代，出版壽命只維持在一二年

① 《國風》只在港大找到館藏一期。堅信國家的愛和對上帝的愛聯合起來，可對抗金錢的貪婪，二者如能在香港的英國和中國市民心中加強並發展，香港能保“偉大城市”地位。

② 如《新語》、《知識生活》、《青年雜誌》、《耕耘》、《博文》等。

③ 如《博文》、《新風》。

④ 如《盤古》出版宗旨之一是評論香港中國以至世界問題，聲明不涉政治如《明報月刊》、《人物與思想》、《中國人》、《耕耘》、《萬象》、《中報月刊》等。

間的刊物竟佔半數。而另一極端現象，是餘下的都屬長壽刊物，且能維持出版期在十至三十多年之間^①。由發刊宗旨考察壽夭懸殊的不同境遇，除了經濟背景外，不難發現長壽刊物的共同特點是能具廣濶的視野與對文化的關切，尤其重視中國文化與世界的關聯。如出版壽命相對短暫但也維持了八年的《中報月刊》（1980—1987），其發刊詞便指出從文化角度看，香港既有思想言論自由，能對中國對世界有影響，可起聯繫作用^②。又持續出版逾三十年的《明報月刊》（1966— ），其編輯精神亦重視數千年中華文化的傳統和價值，因為這是全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寶貴遺產^③。無論如何，在這類刊物中“研究”是在呈現社會使命感的層面上，藉探討和介紹中國文化的切面而融進出版篇幅中去的。

綜觀以上各類社會文化刊物，出版初衷儘管各有不同，但我們仍可自其中發掘其共性所在，即對人類前途的普遍關懷。這體現在它們顯示的社會意識、知識追求、教育責任感、思想與信仰的探索、文化的保存與交流、世界視野等等。過去香港曾在特定時空中佔中西文化交流的優勢，大部分的刊物都希望在這優勢中起着橋樑作用，像《九十年代》（1984—1998）所說的，面對 90 年代的挑戰，與時代脈搏一起跳動^④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肯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，古典文學的研究便是在這樣的一種文化理想中被納入“交流”的版圖。故雖然原非刊佈主題，“研究”資料在五十年間終能聚流成川，成為香港此西化殖民社會中的一朵文化奇葩。

① 出版期逾十年的有《文壇》（1955—1974）、《展望》（1958—1983）、《明報月刊》（1966— ）、《大華》（1966—1971）、《盤古》（1967—1978）、《七十年代》（1970—1984）、《南北極》（1971—1996）、《中國人》（1972—1981）、《廣角鏡》（1972— ）、《大成》（1973—1995）、《百姓》（1981—1994）、《九十年代》（1984—1998）。

② 《中報月刊》“發刊詞”1980. 2，頁 1。

③ 《明報月刊》“發刊詞”1966. 1，頁 1。

④ 《九十年代》內頁副標題 1984. 5。

二、一般文化刊物的“研究”

從宏觀角度看一般文化刊物的“研究”出版，往往牽涉不同時期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特點。大體言之，70年代是五十年間一個分水嶺。70年代的香港社會，被稱為“火紅年代”。從歷史看，是“文革”中國的一片邊緣綠洲。帶着殖民地的標籤，一方面享受着自由與開放，一方面時刻關心大陸覆蓋在紅旗底下的神祕與駭浪。從社會看，歷練50年代以來的普遍貧窮，60年代的工業發展，此時人口不斷增加，男女同工同酬，財富開始積聚。經過中文運動、保釣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等抗爭，社會意識日益濃厚。從教育看，由小學到初中，九年普及免費教育逐步實施，中文大學遷集沙田。從文化看，中文取得合法地位，與英文同為香港的法定語文。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佔重要作用，50年代前已有長遠歷史^①。於此更由殖民社會邁步向前，漸漸晉身國際化都會，商業成為城市重要經濟命脈^②。

刊載“研究”的百餘份刊物中，逾半是50至70年代出版的。其中大半屬一般社會文化刊物，佔50份。換一個角度說，在此類文化刊物的總數量中，50至70年代的佔了四分之三。出版於80年代以後的，只有廿餘份。這樣的出版現象說明80年代前，古典文學的欣賞與探討在不少刊物中佔一定篇幅。這在歷史上是有跡可尋的。羅香林在《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》中指出20世紀早期香港在中國文學上的貢獻：“香港之中國文學，以其涵濡於宗教之經典翻譯，故能中西兼資，而趨向閎通。以其發育於新聞界

① 參閱羅香林《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》“導論”(香港：中國學社，1961年)頁1—15。

② 劉蜀永在《簡明香港史》中指出：“香港經濟結構在70年代以後發生了巨大變化，迅速從工業化經濟發展成一個以加工工業為基礎，外貿為主導，金融、航運、房地產建築和旅遊等行業多元化發展的經濟結構。”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8年)頁289。

之政論與詩文小說，故其讀者普遍，而撰作迅速。以其迴旋於隱逸人士之懷古作品，故其表現精微，而詞藻充美。以其發揚於大學與書樓之專門講授，故其研討廣博，而感發遙深。”^①可見香港研究中國文學之風氣，其來有自。“發育於新聞界”之後，社會上的文化刊物有了“研究”的累累果實，而“發揚於大學與書樓”則澤及後世學院刊物的“研究”出版。余英時在《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》中亦指出自 19 世紀中葉，香港便為中西學術文化的溝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點。又說：“香港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與時俱新，然而對於古老傳統卻沒有發展出一種除惡務盡的態度，這恐怕正是香港的文化潛力的所在。”^②

受殖民政治與商業經濟的影響，長期以來，香港恒被稱為文化沙漠。60 年代論者在談香港的文化風貌時，已直指香港不是一個文化城^③。但我們仍可以非常具體地由“研究”的出版反映過去半個世紀，香港社會中雅文化的內涵與遷變的一面。80 年代以前，學術性的文化刊物中，《人生》的資料最多，達 200 餘種。寫作方式多屬漫談欣賞釋義之類，大部分是短篇，或用連載方式分期刊出，如潘重規《樂府詩粹箋》、何敬群《益智仁室論詩隨筆》、鄧中龍《唐詩偶釋》、梁宜生《韓愈傳略》、王禮卿《〈詩·衛風〉懌釋》、黃華表《清代詩人別傳》和楊胤宗《〈九章〉釋義》等，清楚顯示普及古典文學知識的出版理想。《抖擻》刊行十年，作者中不少是教育工作者。在科學、哲學、歷史、社會和語文的各種報導或論述中，有近 60 種“研究”資料，包括一些外地學者如葉嘉瑩、程千帆、興膳宏、徐朔方等的篇章，和本地學者如李家樹的《從〈文學評論叢刊〉一篇文章看國內〈詩經〉研究的路向》、黃兆漢的《金詞中所表現的一些時代痕跡》、何冠驥的《試論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》等作品。八九十年代其他的學術刊物如《中國文化》和《九州學刊》等，如上所述，主要是

① 羅香林《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》，頁 212。

② 余英時《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》，《二十一世紀》17 期，1993 年，頁 5、頁 6。

③ 黃濟泓《香港文化風貌談》，《盤古》第 5 期，1967. 7，頁 14。

非本土學者的論述。

文藝及文學雜誌除了《文學與傳記》、《香港文學》及1998年復刊的《純文學》在80年代後維持出版外，其餘皆70年代及以前的刊物^①。《文學世界》有百餘種資料，皆當時院校學者的著述。如易君左論《詩經》，曾克崙論杜甫與李白，王韶生論王維詩，勞思光論宋詞流派，金達凱論東坡詞，饒宗頤論顧亭林詩，何敬群論清代傳奇。也有當時年青學者如羅錦堂論北曲小令，鄭利安(士元)論《典論·論文》，陳炳良昆仲編杜詩書目等等，“研究”成果蔚然可觀。《文藝世紀》和《海洋文藝》的作者群多用筆名，尤以前者為衆；“研究”附隨在“文藝叢談”的欄目中。《海洋文藝》有幾個穩定的作者，如學者羅忼烈，其他有思嚴、葉如新和姚芳。其中1979年有施蟄存的3種資料^②。資料寄生在“論壇·講座”的專目中，較為淺近，又比《文藝世紀》的較為詳細。《詩風》的資料範圍絕大部分是《詩經》到唐代的詩。有黃國彬、胡燕青、黃維樑的作品。胡燕青無論是讀太白，想長吉，談杜甫，或給陶潛寫信，都流露深摯的詩心與詩情。外地作者的資料中，包括臺灣李辰冬的論《詩經》和王紅公的論杜甫^③。《純文學》資料近80種，見於每期的“論述”或“隨筆”中，大部分載於72年前各期，臺灣和海外的學者論文有葉嘉瑩、陳世驥、夏志清、葉珊、葉慶炳、林文月等。復刊後則只有葉嘉瑩和陳永正的幾篇。《文學與傳記》和《香港文學》的資料只各一種。可見80年代後資料零落，差別懸殊。

教學及語文雜誌中，要到70年代後期出版的《孔道專刊》和《語文雜誌》才有較多的“研究”資料出現。前者廿餘種，作者群只六七位，以詩文短論居多，如郭霖沅《柳宗元之文學觀》、何沛雄《讀

① 《詩與評論》在1984年出版，只一期。《文學家》出版期亦只維持在1987.3—1987.11。

② 《李後主〈臨江仙〉》(1979.5.10)、《蘇東坡〈洞仙歌〉》(1979.6.10)、《後唐莊宗〈如夢令〉》(1979.11.10)。

③ 李辰冬《〈詩經〉研究二十蔽》(1982.6—1983.10)，王紅公《杜甫論》(1979.6)。

陶淵明的〈閑情賦〉、陳耀南《陳白沙的文論》等。後者十餘種，如陳炳良《研讀中國古典小說的途徑》、陳志誠《關於“葡萄”及韓愈的仿古問題》、范國《〈水滸傳〉中的一些親切詞語》等。1980 年有松浦友久的一篇《“爺娘妻子走相送”——唐詩中的白話及厭戰詩的觀念》。中文大學的兩本語文雜誌皆 80 年代後出版，《中國語文通訊》兼有中大學者和外地學者的資料，共 21 種，其中由何文匯肇始的蘇軾《念奴嬌》格律討論佔 6 種。

政治文化刊物都出版於 50 至 70 年代間。出版於五六十年代的《民主評論》資料近百。以徐復觀和金達凱的作品最多；徐復觀論中國詩歌境界、李義山《錦瑟》、韓偓《香奩集》、莊子藝術精神等等，金達凱論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建安詩、金元明各代詩及散曲等等。黃華表的《清代詞人別傳》共發表了 14 期，湯翼海考釋義山《無題》詩發表了 4 期。此外唐君毅、牟宗三、趙岡、饒宗頤、何敬群、梁寒操、梁容若等一時學者文人都有論述，亦有少數外地著名學者資料如許世瑛、陳寅恪、李辰冬等。《民主評論》的資料形態相對於《文學世界》的長篇論文，屬較短的論述形式，每期一篇，插在政治經濟教育及“中共動態”等專欄中。《祖國周刊》和《祖國月刊》中，帶政治意味的“研究”有趙聰《中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再批判》、陳風《中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再批判與繼承》、鍾華敏《郭沫若詭辭論蘭亭》、陳沛《中共怎樣看待〈紅樓夢〉》、崔一鳴《中共對〈詩經〉的研究》等幾篇。《中華月報》也有岳騫一篇《也談中共批判〈水滸傳〉》。此外《紅樓夢》的資料有 10 種。包括潘重規的 4 篇：《論列寧格勒抄本〈紅樓夢〉的批語》、《“近年的紅學述評”商榷》、《“關於〈紅樓夢〉的作者和思想問題”答余英時博士》和《列寧格勒藏抄本〈紅樓夢〉中的雙行批》。和余英時《關於〈紅樓夢〉的作者和思想問題》、章曼《李、藍的〈紅樓夢〉評論集》、四近樓《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》、陳炳良《近年的紅學述評》、畸石《曹雪芹未必有反清意識》、趙岡《曹雪芹的民族主義思想》等各篇。當中潘、余、趙和四近樓(主)都是 70 年代《紅樓夢》論爭的主要人物。《中華月報》是潘、

余論爭的戰場^①。

《文藝雜誌》及《法言》等宗教文化刊物的資料，皆刊於 80 年代後，只有 5 種，全是本港學者的論述。讀書雜誌的資料亦主要見於 80 年代後，全部共 40 種。但與其說這些資料部分程度反映了八九十年代社會上的讀書風氣，毋寧說它們是本港圖書市場競爭的一種工具^②，是最後遺留的集體文化價值充實了它的出版意義。

綜合性文化刊物中，絕大部分都出版於 50 至 70 年代。80 年代前後創刊的只有《中報月刊》、《百姓》(1981—1994)、《滬息鏡》(1982—1983)和《九十年代》。90 年代則只《中華文摘》(1992—) 一種。雖然有半數刊物在 80 年代後不復出版，但總的來說，在一般文化刊物中，這類刊物的“研究”陣容仍是最大的。資料的特點是其論述屬普及性質，多短篇，作者多用筆名，間有本地或外地著名學者執筆，而題材多以詩詞和古典小說為主。70 年代這類刊物中的資料內容有兩方面值得注意。(1) 論者對郭沫若 1972 年出版《李白與杜甫》的意見。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》的《詩詞曲篇序》中曾作歸納：“圍繞郭書的討論出版於 70 年代特別是 1976 年以前的香港期刊中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是那時候中國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主流以外的另一種聲音。”^③(2) 關於《紅樓夢》的討論。70 年代一般刊物中論述《紅樓夢》的篇章特多，尤以《大成》(1973—1995)、《南北極》(1971—1996)、《七十年代》(1970—1984)、《中報月刊》和《明報月刊》的資料最豐。捲入當年幾個論辯旋渦中的刊物還包括政治文化刊物類的《中華月報》，和學院刊物中的《中文大學學報》、《〈紅樓夢〉研究專刊》。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》的《〈小說、戲曲、散文及賦篇〉序》中亦曾交代論爭

① 詳見吳淑鈿《小說戲曲散文及賦篇序》，載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——小說、戲曲、散文及賦篇》，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.4)頁 2。

② 三聯、商務、天地和中華是香港圖書四大門市(《讀者良友》、《書海》、《天地叢刊》都是它們出版的推廣讀書刊物)。陳不諱《香港出版業》(香港：彩色世界出版公司 1989 年)頁 94。

③ 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——詩詞曲篇》，頁 9。

大概^①。

80年代仍保持出版的綜合文化刊物有《展望》(1958—1983)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廣角鏡》(1972—)、《大成》、《七十年代》、《九十年代》、《南北極》、《百姓》、《中報月刊》、《滄息鏡》和《中華文摘》等。90年代後則只餘《明報月刊》、《廣角鏡》和《中華文摘》三種。在所有的一般文化刊物中，《明報月刊》的出版壽命最長，作者群大都是一時學者與文人。358種資料中，詩詞曲與小說仍佔多數，分別是125種及152種。其他古典文學研究範圍亦廣泛包涵，大都是具學術價值的討論。直到90年代，相對於其他一般刊物中所載資料，它儼然是僅存的碩果了。就資料看，《明報月刊》80年代前後的資料比例約是四比六，有別於其他一般文化刊物。資料聚集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同期同類刊物亡散之故。

總覽一般文化刊物的“研究”，80年代前的資料比較豐富。《人生》、《文學世界》和《民主評論》是前期篇章最多的刊物。《明報月刊》的出版期維持最長，是80年代後資料最多的刊物。從時代劃分的角度看一般文化刊物的“研究”，有兩方面值得再補充。一是資料的消長與刊物的出版生態有關。六七十年代，不少滿懷理想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社會及文化上的承擔精神，願意通過出版刊物來探討文化問題。如《盤古》，蔡康平在《開闢與承擔——謹賀“盤古”之誕生》說：“近年來許多雜誌都倒閉了，還有不少也快走到盡頭了。今天連一份可看的中文雜誌都沒有，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。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問題好像發完了，新一代似乎接不上問題了，腦子是空虛的，思想是貧乏的。”^②表現了“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”的責任感。又如《知識生活》的發刊詞《生命·價值·理想》：“時代苦難中我們應肯定人類的理性，肯定文化，肯定歷史……我們固守的原則：肯定理性，肯定科

① 《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——小說、戲曲、散文及賦篇》，頁2。

② 《盤古》創刊號，1967.3，頁7。

學、民主、民族感情、傳統文化。”^①出版的心意是熱熾的，辦刊物者都有着一顆民族心，把刊物視作中國文化的火種。這類文化刊物在 80 年代後普遍零落，從刊物本身看，無法維持出版，主因可能是經濟上的無以為繼。事實上不少刊物的停刊主因便是“窮”，如梁宜生說，《人生》十九年來，和窮分不開^②。《自由學人》1957 年 10 月開始便經費困難，未能按時出版^③。《大華》的編輯太忙，因為要還文債賺錢，艱苦經營，錢都蝕光了^④。《人物與思想》的《讀者·作者·編者》先是訴說經濟困難，再而發起捐款運動，但結果終於還是停刊了^⑤。《文藝雜誌》是基督教雜誌，最後也因成本過高而停刊。可見這類刊物的生存空間不易維持。

二是從刊物資料的消長，我們可以看到 70 年代前後香港社會雅文化一個側面的變遷。資料數量和寫作隊伍具體反映早期社會人士對古典文學的廣泛興趣；作者群既有學者或大學生，也有教育工作者或一般文人。無論是嚴肅的中短篇學術論文，或是詩文餘事，叢談小調，它們都被那個時代的編者和讀者接納了，在整體社會文化中佔一個或大或小的位置，提供一種由傳統文學散發的古典的品味。80 年代後這部分的資料隨刊物的漸次消失而減少，資料庫中整體的研究無疑變得專精，但精品都入了學院學報的殿堂，文化刊物中猶存的則多屬外地輸入的資料。這確是廿年來社會文化品味轉變的一個切實反映。一個社會文化的轉變，所牽涉的固然非常複雜。例如早期學者文人在這類刊物中的大量論述，可能包藏了一種政治性的心理功能在內；他們將 50 年代被迫遷離大陸後的反省沈澱在文化失國的根蒂上，欲藉古典文學以恢復或加強對傳統文化的體認，期望有機會改變政治前景。但單從文學傳統

① 《知識生活》1963. 9, 頁 1。

② 《人生》1969. 6. 1, 頁 1。

③ 《自由學人》1957. 10, 頁 1。

④ 《大華》1970. 7, 頁 2。

⑤ 《人物與思想》1973. 7, 頁 3。